

李政道倡议建立中国博士后制度

□刘连军

【编者按】今年是李政道先生百年诞辰。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李政道与中国科学》收录了33篇与李政道有过亲身交往的科学家、学者、家人亲笔撰写的文章，勾勒出李政道的卓越智慧、家国情怀，以及他对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贡献。在此摘编书中《李政道先生和中国博士后制度》一篇，标题有改动；作者刘连军，曾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创设“中美联合物理考试”，选拔近千才俊

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是一个新事物，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是经李政道先生建议，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而建立起来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才为先。一方面恢复高考，加速国内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开始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由于当时国内人均收入很低，根本不可能自筹经费出国留学，所有派出的留学生均为国家公费派出。

国门初开，无论是政府、大学还是个人，没有任何与发达国家学校沟通的渠道。那时，中国也没有托福、GRE这样的水平考试，不仅中国不了解外国，而且，外国也不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所以，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很难进入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从而使中国花费的珍贵外汇使用效率很低。

李政道先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于是他给美国排名前50名的大学物理学院院长写信表示，中国有一批年轻优秀人才，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特殊情况，建议采取一种特殊的入学考试方法，即专业考试由美国高校出题，英语考试由中国方面出题。通过这个考试，使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做研究生，费用由美国大学奖学金解决。

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大学的积极响应，这个项目被称为“中美联合物理考试”（CU-SPEA）。从1979年至1989年十年间，从中国选派了915名青年优秀学者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物理学院做博士研究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项目对提高中国留学生派出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着这个项目的影响逐步扩大，又有另一种担心被提出来了。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各方面差距太大，这些学生毕业后还能顺利回到中国吗？如何吸引这些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又成为李先生着急的下一个问题。

优秀学子“送出去”了，如何把他们“引回来”

当时，如何吸引这些留学生回国，除了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生活差距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留学生回国如何安置工作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一方面对后面毕业的留学生有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人才浪费。

如何能做到人尽其才呢？那就要使人才能够自由流动，最终找到最适合的位置。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主要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人事制度问题，一是生活保障问题。当时设想的目标是，让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挑选专业和工作单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当时的人事制度和生活保障制度。为达到这个目标，李政道先生大胆、前瞻地设想，引进国外的博士后制度，以解决留学生回国安置，以及人才流动问题。

“博士后”这个词，在当时国内基本上没人听说过，更不知道如何运作，而且也没有实行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1983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第一批18名博士刚刚毕业，视作掌上明珠，还没有考虑博



上图：1950年，李政道和秦惠君结婚。

《李政道与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士后问题。

1983年和1984年，李先生先后给中央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在中国实施博士后制度的具体方案。在方案中，除了对博士后制度在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说明，还对一些具体做法——机构设置、人事制度、培育方式、经费、生活和住房保障等，有了具体设想。目前，中国博士后制度的运行机制，比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称呼，很多是在李先生的方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84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了李政道先生，专门就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进行了会谈。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李先生的介绍后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育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1985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报告的通知，在中国开始实施博士后制度。

一个博士后家庭，需要二十多种介绍信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员流动主要受三方面问题的困扰，人事制度、生活配给制度和农村、城镇两分的户口制度。

当时，如果用人单位不允许人员流动，不开具人员流动介绍信，个人是流动不了的。越是骨干人才，用人单位越是不放，还会以没收单位住房相威胁。

另外，当时城镇居民实行生活物资配给制，任何生活用品都需要票证才可以购买，光有钱还不行。记得那时一个博士后和他的配偶、子女，从入站到一个博，需要二十多种介绍信，户籍、粮食、副食、配偶工作、孩子入学、入托，连冬天取暖的煤炭都需要介绍信，

缺一不可。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比如公安部、粮食部、商业部、教育部、轻工部、地方政府等等。但是让这些部门为博士后开绿灯并不容易。所以，为推动博士后制度顺利开展，成立了一个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组成，以利于协调工作。尽管如此，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些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根本就没听说过博士后这个词。博士后这个位置在当时中国的人事制度中也没有相对应的名词。所以，对各有关部门的解释工作相当困难，每到一个部门，都要从博士后是什么讲起，它的意义，长远作用等反复介绍，但依然困难重重。

李先生对博士后工作的进展情况非常关心，他不仅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每年回国都亲自参加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的会议，听取进展情况，特别关心遇到的困难。比如财政问题、户籍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他都主动找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去沟通，有时是写信，有时是亲自上门沟通。记得当时因为博士后公寓建设经费迟迟未落实，李先生亲自去找当时担任原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同志去沟通，很快落实了博士后公寓的建设经费。

博士后科研经费不足，李先生又建议成立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当时由于社会上各种基金会鱼龙混杂，国家清理整顿，不再审批基金会申请。李先生又亲自去找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去沟通，使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顺利被批准，小平同志还亲自题写了会名。李先生还担任了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为基金的募集奔走。应该说，博士后制度这一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扎下根，逐步发展起来，没有李先生的建议和持续不断的扶持，那是不可能的。

防止学术近亲繁殖，他有先见之明

1985年11月，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在全国73个单位设立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标志着我国博士后工作正式启动。

李先生亲力亲为，参加每一次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会议，事无巨细，都耐心地加以指导和解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基础科学和防止学术近亲繁殖问题格外重视。

当时百废待兴，一些工程类人才问题迫在眉睫。但李先生认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想发展有后劲儿，必须从长远着眼，必须对基础科学加以重视。1985年第一批批准的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基础学科占了三分之二，接下来几年进站的博士后人员的专业比例，也基本上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

防止学术近亲繁殖，在当时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对它的危害性更是无从谈起。

越好的学校，近亲繁殖越严重。因为，好的学校认为自己的毕业生也是最好的，只留自己的毕业生做教师和科研人员，形成了从师祖、师父到徒弟一代一代的家族式学术梯队。这种情况在当时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是相当普遍的，也被认为是正常的。所以，在当时制订《博士后管理规定》时，李先生强调，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不能在本校做博士后，必须到其他大学去做博士后；第一站做完后，如果要做第二站博士后，必须流动到另一个设站单位。当时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一位教授认为自己的一位博士生很优秀，所以，他非常希望这位博士留在身边做博士后，出站后留在自己身边工作。这从个人角度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局考虑，势必不能克服学术近亲繁殖的问题。几十年来，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李先生的坚持是高瞻远瞩的。

·门外弹乐·

做音乐不忘“爱”之本真

□梅明蕾

国内音乐界，中央音乐学院的朱亦兵教授算得一个“角”。最近他的几则访谈流布于网上，其间聊到个人学习音乐的经历，连结合现实的个人感慨，堪可玩味再三。

朱亦兵自小学习大提琴，早早就出国深造，获得国外专业领域最高级别文凭，后就任著名的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长达15年；同时进修指挥专业，执棒过欧洲多个乐团。以当今世人眼光，堪为“大师”级人物。

本来一切顺风顺水，沿着既定的路子走下去了。可后来在欧洲的一段经历，却不料让他这个成就卓然的职业音乐人对音乐和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认知，继而步入另一条道。

话说当年，朱亦兵接手了一个业余性质的大学生乐团的音乐总监一职。乐团里的乐手所学庞杂，唯独未经音乐专业训练，他们身上的共同之处，则是职业音乐人少有的纯粹心性：演奏不为升学、不为谋生、不为名利，仅仅出于对音乐的挚爱，对经典发自内心的共情。

朱亦兵坦言，在与这群年轻人相处、指挥他们演奏的过程中，他似乎完成了一次艺术觉醒。他由衷感慨，5年时间里，不是他在指导这群业余学生，而是学生教会了他何为真正的音乐。他固然教他们精准、规范、成熟，而学生们的纯粹挚爱则赋予了音乐以真诚、鲜活的生命力，而那些，才可称为音乐的灵魂。

那段经历让朱亦兵重新审视“业余”这个词：“业余”是不是更应该定义为“热爱”呢？而音乐的出发点，可不正是“热爱”嘛。如此掂量下，他决心卸下种种专业名头以及由此带来的光环与傲慢，重新学做一简单而纯粹的音乐爱好者。这种身份的“降级”，也意味着作为欧洲著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他内心

·技术与人·

AI年代的“专家之死”

□刘永谋

近些年来，用“砖家”之类的称呼嘲讽专家，在网上非常流行，折射出社会公众对专家的不满情绪。在未来智能社会中，专家还可信吗？他们与大众的关系究竟如何，又应该如何呢？

在《专家之死》中，美国学者尼科尔斯指出AI年代美国“专家已死”，并预测反智主义盛行迟早要给美国带来大麻烦。

尼科尔斯的“专家之死”指的是，在智能社会中，美国专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逐渐停止，老百姓对专家和知识怀有敌意，反专家情绪盛行。为什么会如此呢？尼科尔斯分析了诸多方面的原因：1.人性方面的原因，比如，人类生来喜欢抬杠，容易沉浸于自我幻想，专家指出民众的错误会被民众视为一种侮辱；2.达克效应，即越蠢的人越自信；3.证实性偏见，即只看得见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却看不见反面事实；4.平等偏见，即美国人喜欢在什么问题上都要平等，也要平等对待专业意见和非专业意见；5.智能革命之后，美国高等教育、互联网、新闻业和专家自身的不利因素也饱受争议。

尼科尔斯还指出，AI时代美国的新闻界也没有站在专家一边。AI时代新闻娱乐化以后，消费者根本不关心重要的问题，更不关心新闻提供者专业不专业，而信息过载又让美国人几乎不相信任何新闻节目。

·序跋集·

大明宫见证权力逻辑彻底颠覆

□于赓哲

本书涉及考古，也涉及历史。多年来，我一直想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是在考古遗址上写历史。为什么选择大明宫？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大明宫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宫殿无数，阿房宫、未央宫、太极宫、紫禁城……然而，没有哪一座宫殿如大明宫这般，以其兴废之轨迹，如此完整地映照出一个王朝从崛起到鼎盛再到崩溃的全部历程。

大明宫的出现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隋文帝建立的新长安城已经足够壮观规整，然而唐朝却要在其东北角另起炉灶，建造一个全新的巨型宫殿群。这绝不是简单的扩建，而是唐代帝王们各种内心活动的集中展现，曲折反映了唐朝的宫廷内部形势，堪称一部写在宫殿建筑上的历史。从选址到布局，从规模到形制，大明宫的每一处设计都透露着那个伟大时代的雄心与气魄。

它的规模令人震撼。大明宫的面积达到约3.2平方公里，而北京明清紫禁城的面积仅有0.72平方公里，其体量几乎是紫禁城的四倍有余。其三大殿——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沿同一轴线分布，气势恢宏，北京故宫三大殿的布局正是借鉴于此。含元殿作为大唐王朝的象征与门面，殿基高出地面约15米，宫殿主体面积达3225平方米，与此相比，紫禁城太和殿基址高仅8.13米，面积2377平方米，含元殿的雄伟程度可见一斑。正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所以号称“千宫之宫”，当年可以俯瞰整个长安，堪称唐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

从贞观八年（634）开始建造，到龙朔三年（663）全面建成，在其存续的二百余年间，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价值的翻转。

这之后，朱亦兵也有了新的人生选择。他主动联系央音领导，诚恳表达了回国教学的意愿；他反复强调，这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辞去了欧洲乐团的职务，放弃了当初孜孜以求的荣誉和光环。回国后，他出现在各大音乐厅舞台上的频次大大减少，反倒是带领学生面向社会各界多做公益和普及。用朱亦兵的话说，那里才是永远没有毕业之日的学校。

朱亦兵旅居国外20多年，回到国内也看出些问题。近些年，音乐学院也“卷”得可以，入职门槛水涨船高，博士文凭是“起步价”，在此基础上再论高下。由院校延至社会，传统音乐体系中，考级证书、专业文凭、职业编制、舞台头衔，常常被视作判断能力或水平的唯一标准，而音乐中最重要的发自内心的挚爱和共情，反倒被忘得一干二净。

朱教授对此当头棒喝：文凭是什么，文凭就是个驾照嘛，驾照只是入门上路的资格，今后学习之路还长得很，怎值得现在就金榜骄傲？好在朱亦兵在古典音乐界曾经沧海，出言自有分量。

审视“业余”内涵，警惕文凭崇拜，看起来是两回事，其实相互关联。以我的观察，国内“玩”音乐的人群中，“业余”非但不会定义为“热爱”，反倒是长长鄙视链中最末一环。眼见一些乐队排练，其中的业余爱乐者全情倾注，专业人士反倒因长期谋生或忙碌而现出审美疲劳；或有“博士”头衔者，虽表现平平，却不会被批评，反倒受追捧。人们执着于“资质”的光环，却忽略了“热爱”的本真；纠结于“不够专业”，却忘记了“不够真诚”。朱教授的感慨，更像是一面镜子，照清现状，引人三思。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智能革命后的世界》。

另一方面，专家也会出错，这也导致公众对专家产生不信任。尼科尔斯将专家的犯错称为“专家失灵”，并指出了四种失灵的情况：1.正常的失败，因为失败是科学研究和做学术的正常组成部分；2.专家跨界发言；3.专家冒险进行预测；4.故意的欺瞒。

我认为，在智能社会中，专家不能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如今，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家都是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地位平等。专家要时刻意识到自身专长的局限性。所谓专家，即拥有某种专长，但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擅长的人，他们甚至对专业之外的事务的了解可能还不如普通公众。因此，专业之外的事情，专家最好不要置喙。

现在，一些专家因为某种专长获得了社会声誉，于是对自己认识不清，或者心态膨胀，什么事情都要发表意见，俨然“万事通”“万金油”。对于跨界发声的专家，大众要有分辨力。不要认为只要是大专家说的，就盲目相信，要充分利用智能平台和AI工具等仔细审视，独立思考。专家谈专业之外的事情，大众不必当真，权且作为一种意见而已。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网上，专家发表的意见只具有参考性，并非百分之百正确。总之，专家离开自己的专业，就不再是专家。



摘编自《风雨大明宫：唐代政治缩影史》前言。

几乎所有决定唐朝命运的重大事件都在这里上演。

这里见证过大唐帝国最辉煌的时刻，它曾经是整个东方的中心、大唐的心脏。各国使节争位夺门的故事，足可见证当时国际关系的纷繁复杂和唐朝国际地位之重要。

在这里，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权力博弈拉开了帷幕。在这里，安史之乱后的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在这里，藩镇割据的阴云越积越厚。“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里。

大明宫的毁弃，更非一朝一夕之事。晚唐军阀混战，大明宫屡遭劫难，早已面目全非。至朱温时期，这座自唐太宗时期初创、存续了二百余年的宫殿，与整个长安一起，最终走向毁灭。天祐元年（904），朱温挟持昭宗东迁洛阳，长安宫殿残存的宫室木材被拆毁投入渭河，成为洛阳新宫殿的材料。

大明宫的兴废，与唐王朝的盛衰紧密相连。它的辉煌，彰显了大唐的强盛与开放；它的毁废，预示了李唐王朝的覆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帝王将相上移开，投向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芸芸众生，我们会发现，这座宫殿的沉重更在于它所映照出的民生疾苦。

如今，大明宫的遗址静卧在西安的北郊，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本身就是一次出色的社区改造。这座昔日帝王将相的宫殿，已经成为人民的宫殿。从“天下之中”到“人民之中”的历史性蜕变，不仅是空间的转换，更是权力逻辑的彻底颠覆。历史在这里画了一个巨大的圆，而这个圆所承载的，是我们民族记忆深处最深沉、最动人、最值得反复品读的一页篇章。

快 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为了人与书的相遇”为使命。本期《快览》介绍该社近期6种好书。

《最好的时光：文艺经典十一讲》 王晓明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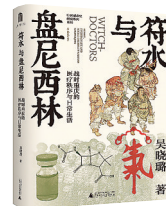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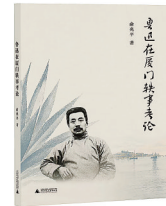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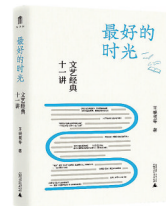
书中收录了王晓明、毛尖、罗岗、倪文尖等九位名师在课堂上的文艺选读讲演，十一堂文学影视经典导读课，从《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到《城市》《局外人》《大路》等，引导学生思考文学、文艺对于现代社会精神困境的现实意义，体会文艺作品中的人生滋味。

《鲁迅在厦门轶事考论》 俞兆平 著

本书为厦大学者深耕多年的鲁迅史料考证力作，恰逢2026年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百年节点，针对长期流传的“鲁迅遭苛待、地窖居住、拍案怒斥校长”等坊间传言逐一辨伪勘误，以《两地书》、鲁迅日记、同期亲历者一手回忆为坚实依据，澄清近百年文坛公案，还原一段被舆论简化的文学史往事。

《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 吴晓璐 著

本书以微观史的视角，依托田野调查与多元史料，讲述了抗战时重庆巫医治病与现代医学并存的奇异图景。书中透过普通人的医疗经历，揭示了巫医是一种深嵌于日常习惯之中的文化权力，它与袍哥的结拜仪式等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基础。



《酱园弄凶案：变动时代的女性、司法与社会》 彭哈 著

一部聚焦1945年上海酱园弄杀夫案的法律社会史著作。作者基于上海市档案馆未刊档案，详细还原了唐周氏从受虐妻子到杀夫者、再到被舆论拯救的全过程，为读者呈现一个真实、复杂的历史现场。同时，书中细致梳理了这场舆论战中的各方声音，生动呈现了变动时代下女性、司法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纠缠。

《野蛮博物馆：贝宁青铜器、殖民暴力和文物归还》 [英]丹·希克斯 著

1897年1月，一小队英国官员和商人在前往贝宁（今尼日利亚境内）的途中遭到伏击。2月，一支英国“惩罚性远征军”入侵西非古城贝宁。这座拥有千年文明、璀璨艺术与严密制度的王国都城惨遭屠戮与洗劫。数以千计的王室圣物与艺术瑰宝——举世闻名的贝宁青铜器被掠夺一空，流散全球。

《花生的奴隶：奴役、解放，以及复杂历史的作物》 [美]约里·刘易斯 著

本书以花生为线索，串联起19世纪以来西非的奴隶制、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同于以大西洋奴隶贸易为中心的传统叙述，本书深入揭示了西非内部奴隶制的延续过程，作者将欧洲工业对油脂的需求、法国肥皂工业、花生种植的扩张与殖民统治逻辑紧密结合，清晰展现全球市场如何在“合法商业”的名义下，制造新的剥削结构。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